

Dominic Sachsenmaier & Jens Riedel 等 編著 | 郭少棠、王為理 譯

多元現代性的反思

歐洲、中國及其他的闡釋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多元現代性的反思

歐洲、中國及其他的闡釋

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任斯·理德爾 連同
施繆爾·艾森斯塔德 編著

郭少棠、王為理 譯



中文大學出版社

《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的闡釋》

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 等編

郭少棠、王為理 譯

中文版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299-9

© Copyright 2002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is arranged with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in Chinese)

Edited by Dominic Sachsenmaier and Jens Riedel with Shmuel N. Eisenstadt

Translated by Siu-tong Kwok and Wang Weili

Chinese edi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299-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鳴謝

編輯像《多元現代性的反思》這樣的著作需要眾多學者高質量的稿件。在此，編輯們對所有與波士頓諮詢集團戰略研究所 (BC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的有關同事們表示感謝。在戰略研究所2001年慶典時舉辦了一系列討論會，促成了支撐本書的研究工作。如果沒有波爾科·馮·俄廷格 (Bolko von Oetinger) 毫不鬆懈地尋找和熱愛理解更新、更好的(商業)世界，本書不可能問世。他認為「多元現代性」就是這麼一種方法，他為本書完成作出了貢獻。我們還特別感謝蒂哈·馮·濟奇 (Tiha von Ghyczy)，他從一開始就對這個課題關心。海地·艾科特 (Heidi Eckert) 也從一開始就竭力促使所有組織事務走上正軌，在本項研究的所有階段都保持了高度的熱情。

柏林科學中心 (Wissenschaftszentrum in Berlin) 熱情地為有關本書撰寫的會議提供了場地。我們感謝該中心主任于根·科佳，以及格奧爾格·瑟恩、比吉特·漢和迭特瑪·克倫瑟。

當各篇論文撰寫完畢，成為校樣的時候，特德·布斯維克 (Ted Buswick)、南茜·麥克米蘭 (Nancy Macmillan)、後來還有西維亞·洛特里奇 (Silvia Löttrich) 等人做了大量工作，以盡可能地確保本書清楚無誤。我們還感謝萊拉·諾德曼和朱蒂·采伊，她們校對並修訂了參考書目的錄入。

我們也非常感謝布里爾公司的編輯佐德·愛里希 (Joed Elich) 和拉金·蘭克 (Regine Reincke)。布里爾公司的員工隨時迅速答覆我們的問題，保證了出版程序的順利。

D.S.

J.R.

S.N.E.

前言

波爾科·馮·俄廷格

波士頓諮詢集團旗下的戰略研究所非常高興充當多元現代性會議的東道主。這次會議於2001年5月20–21日在德國科學中心舉行，與會者都是主要的國際社會科學家。這本書的出版，使得沒有機會參加本次大會的公眾，尤其是研究人員與學生，得以接觸到與會者的論文。

戰略研究所一直以來對於多元現代性領域的關注，源於我們對戰略性質的廣泛興趣。與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人員合作，豐富了我們對戰略、對商業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的理解。柏林會議為實現這個目標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我們的目的就是通過出版來使我們的研究公諸於眾。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不同的現代性的世界，包括西方的和非西方的——這一觀點是對典型經濟思想的挑戰，意圖通過界定廣泛接受的、普遍使用的「規律」和「法則」，以及通過普遍地忽視影響到經濟決策的非經濟因素，來使經濟環境同質。柏林會議對全球經濟的複雜性提供了實質性洞見。商業世界對福山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以及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衝突與重塑世界秩序》）的普遍興趣，標誌著他們日益關注非經濟因素。雖然所有主要的西方公司都極力利用（按該詞的最好的意義）所有在經濟上對它們有利的全球機會，但它們逐漸認識到，不同社會有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回答、不同的方法。不幸的是，對正確問題、答案和方法的追尋尚未為商業和公眾政策產生實際的、有用的結果。迄今為止，世界經濟論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都未能提供有用的指導。很顯然，我們只是為一個複雜的對話開了個頭。

當然，僅僅靠幾個簡單的規則或概念，是無法在高水準的歷史社會學闡釋與世俗的、掙扎著要生存或擴張的日常商業決策的鴻溝上面

架起一座橋樑的。這個鴻溝需要探索。鴻溝兩端隔得如此之遠，以至簡單的解決方案是不存在的。但仔細觀察多元現代性的各個方面，以尋找一個可以理解的路線，應該還是值得努力的。這就是柏林會議的目的。正如這些文章所表明的，應對一個多元現代性的世界，並沒有一個主導性的解決方案，甚至也無法確定問題所在。本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引發廣泛的闡釋，並展開其中對話。因此，這些文章提供了一些預感，一些有待探索的觀點，以及一些微弱的標記，追尋這些標記，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們這個全球經濟的複雜性。

我們並不明確地知道現實是怎麼樣的，因為現實依然從屬於文化闡釋。多元現代性是眾多互相競爭的對歷史、當前現實、對我們這個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及其中的各種文化的闡釋之一。通過提供一個追尋答案的新論壇，有助於我們思考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然而，在這麼一個初創期，我們首先期望的，是要找到一些新的問題。

我們鼓勵對經濟事務有著濃厚興趣的讀者擁抱多元現代性的世界，因為它清楚地拓寬了人們的經濟視野。我們希望讀者有著明確的社會學和歷史興趣積極參與這個領域，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對分析我們社會以及歷史的意義保持充分的興趣。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來自於這個社會，更有甚者，我們正走向這個社會。如果讀者將經濟學的、社會學的、歷史學的兴趣融合在頭腦中，那麼在尋找對當今世界及其未來發展更加豐富的闡釋上，他們就有了最好的起點。

中譯本前言

郭少棠

當部分國家已踏入後現代歷史階段的時候，現代化或現代性的課題的探討已有了新的轉向。這個轉向是當前第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

當二十一世紀拉開序幕不久，9·11世貿大爆炸和伊拉克戰爭迫使人類做出反思：經濟和軍事強國的外交霸權主義能否帶來世界和平？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所帶動的「西化」和「現代化」浪潮，直接或間接把人類引入二十世紀兩次世界性戰爭的苦海，9·11世貿大爆炸和伊拉克戰爭的悲劇或多或少是建構二十世紀新國際秩序過程中的陣痛。究竟歐美國家所啟動的現代化「鴻圖大略」或由之而催生的現代性價值應如何定位呢？這是當前第二個重要的時代課題。

這都是新紀元人類必須具體反思的兩大課題。

在全球化巨輪的滾動下，文化的移動和互動已愈來愈迅速和緊密。文化移動和互動的結果是文化的互匯或衝突。文化的本土化和全球化加深了文化移動和互動的複雜性，使原來已經縱橫交錯的文化演變歷程來得更難以捉摸。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啟蒙運動的科學主義和進步主義觀念影響下的文化圖像必須再次被審視。《美國藝術和科學院學報》《代達羅斯 (Daedalus)》在2000年先後刊登兩期專輯，分別探討「早期現代性」(early modernities) 和「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自此以後，這個由施繆爾·艾森斯塔德 (Shmuel Eisenstadt) 所倡議的概念，以複數取代單數來描述現代性在社會科學中迅速而廣泛地被應用，不同的研究計劃和書刊都涉及該範式。路易斯·郎力加 (Luis Roniger) 和卡路斯·衛斯曼 (Carlos Waisman) 直接從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度研究全球化和多元化現代性，顯示兩個大陸之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現代化發展。年青的德裔中國史學者多明尼

克·薩赫森邁爾 (Dominic Sachsenmaier) 邀請具全球影響力的波士頓顧問集團策略研究機構 (The Strategy Institute of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並徵得德國著名研究機構柏林科學研究中心協辦，於2001年5月在柏林組成一個以多元現代性為題的國際社會科學研討會。研討會的論文由薩赫森邁爾、任斯·理德爾 (Jens Riedel) 和艾森斯塔德編輯成集，文集選名為《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的詮釋》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2002年12月，薩赫森邁爾與柏林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德國史家于根·科佳 (Jürgen Kocka) 在該中心組織另一個多元現代性跟進研討會，主題為「從意識形態與史學的關係探討多元現代性」，筆者應邀參加。會議結束後，筆者建議把《多元現代性的反思》譯成中文，向華文世界讀者介紹這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新話語。透過薩赫森邁爾的轉介，取得出版社和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支持，波士頓顧問集團的贊助，委託本人審閱及深圳社會科學研究員王為理負責翻譯，促成這本重要的論文集集中譯本面世。

現代化研究的冒起與演進實際是世界現代史發展的典範的探索。筆者70年代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追隨政治學者Reinhard Bendix、歷史學者Walfgang Sauer, Martin Jay、杜維明和Franz Schurmann研究比較現代化和比較中西思想史。當時正值現代化理論風氣旺盛之際，John Brode著的*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the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1970) 整理了五十年代西化 (Westernization) 和現代化理論的英語世界較重要的條目，其中最受注目的要數Alexander Gershenkron, "The Early Phase of Modernization"; W. W. Re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in Russia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艾森斯塔德的*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1966) 和較早面世的D.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1958) 及Cyril Black, *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 (1966)。側重從經濟或工業化角度分析西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又從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入手研究比較現代化。在70年代初較具代表性的有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1977);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1971)。歐美英語世界研究現代化大概在70年代中期達至高潮。這股潮流主要修正了四、五十年代以來西方中心的西化理論，而嘗試從比較發展的宏觀架構下來排列不同國家和社會在現代化歷程中的位置和特色。

歐美這股現代化研究潮流在70年代傳至台灣史學及社會學界。金耀基的《從傳統到現代》和《這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央研究院組織一連串大規模的區域研究，試圖為這個現代化歷程探路，其他綜合性論述亦在這個時期出現，包括蘇雲峰(1981)，張玉法(1982)，李國祈(1982)，張朋園(1983)，王柏槐(1984)。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告終，華國鋒倡議「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而大陸民主運動者則補充「民主化」為第五個現代化。到70年代末，中國正式走上經濟改革的道路，文化學術思潮同時做出回應，一股文化熱潮逐漸澎湃，因而出現未來學、科學系統學說及其他較接近西方的思想。大批西方發展理論，包括上文所述的論著，都先後被翻譯成中文。還有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所1987年發表的《走向現代化的抉擇——關於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的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章開沅的《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淺析》(湖南人民出版社)。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動蕩，羅榮渠仍領導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史進程研究中心全力推動中國和比較世界現代化的研究，他在1990年至1993年先後出版了幾本甚具影響力的有關著作，包括他個人所編的《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勢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1990)，《現代化理論和世界現代化進程西方參考文獻目錄選編》(1990)和《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譯文集(1993)。

內地研究現代化的理論和歷史經驗熱潮到了90年代中開始逐漸降溫，部分原因是其中一位研究學者羅榮渠急病離世，他在北大的研究中心仍然運作，但氣勢已不如以前。台灣學者在80年代中期以後已逐步放棄對現代化問題的探討(見郭文)。

筆者在1992年出版首本以中文撰寫研究德意志政治文化現代化的專著，1995年出版研究西方政治現代化進程中民族國家與國際秩序成長的史學史專著。自從這兩本專著面世後，筆者研究比較現代化的路

向亦隨著當時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思想衝突而做出較重要的改變，這種改變實際也是對比較現代化研究理論的一種本質上的修訂。

筆者選擇的理論朝著兩個新的方向發展。第一是從比較現代化轉向跨文化和文化移動、遷移的架構。在文化的移動和跨越的理念下，社會文化的特徵相對時空的轉變隨之而變動。文化的跨越蘊涵著文化的多元性 (plurality) 和混雜性 (hybridity)。第二，近代社會文化的本土性質和全球化發展之間出現不同形式的接觸與互動，不同社會的文化既不能完全孤立於其他外來文化的遷徙或移動，但亦不會完全產生文化的全盤更換和變革。地域主義和本土特色始終為文化的塑造提供重要的土壤。比較研究假設著孤立而單純的文化主體。文化的演變是混雜而多元的。由此類推，本土社會的經歷的現代化歷程是沒法完全雷同的。它們的蘊涵或展示出來的現代性也自然是無限的多元性。就算在同一個民族或國家之內，不同地區的現代化經驗可能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一個地域廣闊而文化複雜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實際很難超越這些地區的差異性，更不易忘記這些地域在不同形式的發展的時空環境下產生歧異的回應。

由薩赫森邁爾等主編的《多元現代性的反思》論文集，所有論文採取較宏觀的角度反思中西方現代化和多元現代性理論，雖然沒法深入和有力地展示多元現代性理念最核心的構成性質：文化的混雜和流動性，但起碼已將60年代以來所接受的片面而僵硬的現代化理論做出徹底的修正。這本重要的論文集得以譯成中文面世，肯定對華文學術界有志於現代化或者現代性的研究人員有重大的啟示和衝擊。

目 錄

鳴謝	v
前言	vii
波爾科·馮·俄廷格	
中譯本前言	ix
郭少棠	

第一部 導言

多元現代性範式的背景	3
施繆爾·艾森斯塔德、任斯·理德爾、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	

第二部 多元現代性討論的參數

1 對多元現代性的幾點看法	29
施繆爾·艾森斯塔德	
2 多元現代性——概念及其潛力	43
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	
3 全球化：現代性最新的形式？	69
布魯斯·瑪茲里施	

第三部 西方現代性與普遍主義的論戰

4 全球化世界中的文明與國家	81
普拉森吉特·丟拉	
5 全球性反現代主義	103
馬克·吉爾根斯邁耶	

第四部 多元現代性與世界共同體的前景

- 6 多元現代性與經過協商的普遍性 123
于根·科佳
- 7 作為一項社會發展議程的互相學習 133
杜維明

第五部 中國的現代性

- 8 另類現代性在東亞的興起 143
金耀基
- 9 中國的現代性 159
小弗里德里克·魏克曼

第六部 歐洲的現代性

- 10 二十世紀歐洲的自我理解 175
哈特穆特·凱爾伯爾
- 11 憲法實踐還是記憶共同體？——評歐洲的集體認同 199
波恩哈特·吉爾森

第七部 經濟學方法

- 12 多樣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構築商業體系中的作用 221
理查·惠特雷
- 13 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在文化框架中去理解 245
戈登·雷丁

第八部 結語 對商業世界的啟示

- 14 多元現代性的視角：豐富商業策略 275
任斯·理德爾
- 作者小傳 299

第一部

.....

導 言

多元現代性範式的背景

施繆爾·艾森斯塔德、任斯·理德爾、
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

2000年冬，繼討論早期現代性的專輯後，¹《代達羅斯》又出版了一期討論多元現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 的專輯。²從此，多元現代性這一術語在社會科學中迅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³一些重大的研究項目已經展開，許多大型研討會和學術著作也已經在使用該術語。如今這一術語正日漸成為社會科學期刊《通用語言》所刊載文章的一部分。⁴從它迅速為人所接受來看，我們可以預料，蘊含在該概念之中的複雜問題將成為一些主要學術討論的對象。⁵

多元現代性的核心在於，它假定存在著由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政治狀況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現代性。這些不同形式的現代性在價值體系、各種制度及其他方面在將來也依然會存在著差異。舉例來說，在現代社會的各種制度中，無論是家庭模式，還是社會經濟制度及大眾傳播，結構性區別都是一個典型的特徵。然而，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時期，這些區別性的結構，開放的模式，以及對基本前提的質疑思路，都有著極大的差別。不同的活動家和社會運動對一個社會的現代化構成因素有著不同的觀點，由此他們創建了各種獨特的現代性形式。換句話說，即使極為現代的結構、制度和文化體系已經遍及全球，各個同樣現代的社會也還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借鑒和採用它們的。這些社會以彼此的現代性情形為參照。尤其是以歐洲的、後來是美國的現代性動態模式為參照，來決定取捨，而且日後仍將如此。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多元現代性迥異於西方社會學的那些經典研究方法，後者儘管有著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但它們全都傾向將現代化等同於世界文化的同質化。多元現代性觀念是在近來的一些事件與事態發展的背景上形成的，尤其是全球化進程和蘇聯的解體，這些事件使有關當前現代世界性質的問題更加尖銳。的確，在21世紀初，對現代文明的新展望或理解已經越出西方——即歐洲與美國，第一個現代性文化規劃(program)得以發展的地方——擴展到亞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社會。此外，當代世界持續的全球化進程也提出了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說，20世紀的終結是否標誌著現代性的終結，即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得到發展的現代性規劃的終結。

當代世界是不是一個從現代化事業中敗退下來，走向歷史的終結或文化的衝突的世界呢？⁶「歷史的終結」宣告了世界的非歷史性同質化，其中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前提及其所有的張力和矛盾都變得幾乎無足輕重，卻似乎悖理地使多種後現代的現象增加。與現代規劃終結論相反的觀點則認為：當代世界受一種反現代的、原教旨主義的、反西方的運動和文明的倒退傾向控制，在這種觀點看來，西方文明，即表面看來現代性的典範，面臨著現代性的其他範例，尤其是穆斯林和所謂儒家的現代性範例，而且彼此之間通常都帶有敵意。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形形色色的闡釋，有一點是明顯的，即這些說法都要求對現代性和現代化作深遠的重估。與這些看法相反，多元現代性的觀念的主要論點是，理解當代世界和現代性的歷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將它視為多元變化的、常常相互競爭、相互對抗的現代性不斷發展形成、不斷構建和重建的過程。

多元現代性的概念本身與古典社會學的某些顯性或隱性的假定是相反的，尤其是與20世紀50、60年代盛行的那些現代化理論以及當今流行的某些熱門議題相反。

從20世紀50年代起，經典的現代化理論將現代性的核心，現代社會結構的核心，看做是對舊的、「封閉的」構成的分解，如卡爾·德伊奇(Karl Deutsch)所說，等同於社會動員之日益增長的潛勢及其相伴而來的新的結構、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特徵的發展。為相對狹窄的構成

要素的分解所證實的現代性最重要的結構方面的特點，是日益增強的結構分化趨勢，這一趨勢在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以及在不同的傳播渠道和教育機構的持續發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制度層面上，這類分解導致了新形式的發展，比如現代國家、現代民族等集團的出現，新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等等，這些新形式至少在某些程度上被看作或被定義為自主的，它們也確實為不同的機制所支配。與此同時，現代性也被看作是包含了一種不同種類的文化規劃，它塑造了不同類型的個體特性。

20世紀50、60年代盛行的各種現代化理論，以及馬克思、塗爾幹(Durkheim)的經典社會學分析，甚至在很大程度包括韋伯，⁷或至少就對他的一種解讀而言，在現代性在西方形成之時，就已經或明或暗地將現代性的那些主要層面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即便這些層面在分析的時候是各自有別的，它們在歷史上也依然是不可區分的。早期現代化研究的一個非常牢固的——即便是含蓄的——假定是：現代性的文化層面——即西方現代性的基本文化前提，「世俗的」合理性世界觀，包括對人的非常個人主義化的看法——內在地與其結構層面相互交織在一起。同時，大多數社會學經典論著，二次大戰後幾十年間的現代化研究，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工業社會之趨同的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都認為，在歐洲現代性中得到發展的基本制度格局、制度領域的界定及其調節與整合模式，以及在西方得到發展的現代性文化規劃，必將為所有正在現代化的社會所「自然地」吸收，儘管會出現一些地區變異。它們進一步假定，這一現代性計劃，連同其霸權性和同質化(homogenizing)的傾向，不僅在西方將得以繼續，而且將盛行於全世界。

然而，現實中發生的一切卻證明與此迥異。當今時代的發展狀況並沒有證實工業社會將走向趨同的假設。諸如經濟、政治、教育體系、家庭等各種制度舞台的實際發展狀況，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期，是以不同的方式得以明確、調節和匯合的。現代社會巨大的差異性變得越發明顯了，即便那些經濟發展狀況曾經極為相似的社會，如歐洲、美國和日本，也不例外。桑巴特(Sombart)在20世紀最初幾十年